

总主编 吴敏先 阎海涛

共和国辉煌历程

探索征程

主编 / 阎海涛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主编 吴敏先 阎海涛

共和国辉煌历程

探索征程

主编 / 阎海涛

吉林人民出版社

作者名单

主 编	阎海涛	
副主编	贾莉敏	
作 者	孙堂厚	陈延秋
	翟洪峰	王 英
	贾莉敏	

目 录

第六篇 探索新道路

第一章 上下求索	(345)
一、开辟新征程	(345)
二、论十大关系	(348)
三、“八大”的创造性成果	(353)
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358)
五、理论探索新成果	(363)
第二章 事与愿违	(369)
一、良好的初衷	(369)
二、“事情正在起变化”	(374)
三、反右斗争	(376)
四、“三面红旗”的迷惘	(382)
第三章 初步纠“左”	(391)
一、关于读书的建议	(391)
二、两个界限不能混淆	(394)
三、“压缩空气”	(397)
四、“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400)
五、工作方法十六条	(407)
第四章 庐山风云	(411)
一、赋诗《到韶山》	(411)
二、开个“神仙会”	(413)
三、风云突变	(419)

四、全党“反右倾”	(426)
五、“包产到户”受挫	(432)
六、共和国十年总结	(437)
第四篇 困难中复兴	
第五章 痛定思痛	(445)
一、困难中思索	(445)
二、紧急指示信	(451)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456)
四、采取非常措施	(463)
五、甄别与平反	(471)
第六章 “八字”方针	(477)
一、“八字”方针出台	(477)
二、七千人大会	(481)
三、国民经济全面调整	(491)
四、各项政策稳定人心	(496)
第七章 国民经济复兴	(503)
一、调整之策成功	(503)
二、吹响进军“四化”的号角	(507)
三、经济复兴的标识	(510)
第八章 任尔东南西北风	(514)
一、麦克马洪线冲突	(514)
二、盟友与对手	(522)
三、求同存异的魅力	(527)
第九章 十年建设成就	(533)
一、独立工业体系形成	(533)
二、农业建设大规模展开	(539)
三、教育科技长足进步	(542)
四、华夏升起蘑菇云	(547)

五、英才济济	(553)
六、祖国是根	(559)
第五篇 板荡岁月搏击	
第十章 政治狂澜	(567)
一、文革发动	(567)
二、全国大动乱	(574)
三、“夺权”风暴	(576)
第十一章 动乱中的抗争	(579)
一、奋力抗争	(579)
二、凛然正气	(583)
三、人民的呐喊	(589)
四、力挽狂澜	(596)
第十二章 正义战胜邪恶	(604)
一、林彪集团覆灭	(604)
二、整顿中的较量	(614)
三、四五运动	(627)
四、粉碎“四人帮”和文革结束	(634)
第十三章 动乱中的进展	(646)
一、国民经济起伏缓进	(646)
二、太空奏响《东方红》	(653)
三、金种子的希望	(658)
第十四章 外交工作新局面	(664)
一、小球转动大球	(664)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	(672)
三、重返联合国	(679)
四、第三世界的友好合作	(683)

第三篇

探寻新道路

第一章

上下求索

一 开辟新征程

中国的道路究竟怎么走，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以来，欧风美雨所熏陶的一代仁人志士就开始思考中国的变革图强之路。各种治乱兴国的良方也纷纷应运而生，曾经激励了几代人投身于救亡图存的历史大潮之中。潮起潮落，几番风雨，每每以失败而告终，浸透着浓重的悲剧色彩。

1956年，一个不平凡的年代，一个伟大变革与转折的年代。

曾植根于中国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社会很少受到震动的情况下从根本上被彻底废除了，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开始生根、发芽、开花，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继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之后在中国实现的又一伟大历史性胜利。这次转折，为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伴随着这一历史转折，一系列全新的课题呈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案头。而在中国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全党上下精神

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

环视全球，人民共和国的北邻大国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锋和探路人，此时建设社会主义已有近40年的历史。在这近40年中，苏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把一个原来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可与西方国家抗衡的强大国家。这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必然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仰慕、向往。“学习苏联”，便成为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最流行的语言。

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明天”口号宣传下，年轻的共和国自然而然地从整体上采纳了苏联的模式，走上了苏联走过的道路。如在所有制方面，过早取消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严格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效法苏联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在经济管理方面，特别是工业、金融、统计及计划工作等方面基本上也是采用苏联模式。勿庸讳言，我们当时学习苏联一些好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对于增强国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1953年3月，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开始了向新方针、新格局的转变。随之而来，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亦逐渐体现出来。特别是由于斯大林晚年陷入“左”的错误，搞了许多教条主义的东西，致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不少弯路。苏联模式缺点、错误的暴露，表明苏联“老大哥”远没有探索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无论是经济管理体制还是经济建设的方针，都解决得不好；在政治建设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道路与模式如何，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什么等等，苏联的实

践也没有提供成功的经验。市场商品不足、货币不稳、人民不满、民族关系紧张等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而我们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体制的某些弊端，实际工作中一些盲目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与经济的教条主义倾向也开始暴露出来。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开始集中精力思考斯大林的错误和克服我国在学习苏联过程中某些教条主义倾向。从1955年他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试图改变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少走弯路。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在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神圣的礼堂里，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用粗暴的语言指责、全盘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被披露后，在东西方世界产生强烈的震动。一方面，由于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各国反动派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各国反动派以反对“斯大林主义”为名，乘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中国共产党以国际共运面临的巨大困难为忧；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揭露与批判，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缺点错误的揭露，使社会主义各国的人们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非完美无缺。这就给人们打破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迷信，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思考如何巩固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提供了契机，当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契机。

毛泽东后来曾指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提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对斯大林问题的批评，以及对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反思，在中国共产党

人的脑海里激起了思想解放的束束火花。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自己的经验，加快了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步伐，开始矫正人民共和国这艘红色之舟行进的航向。

二 论十大关系

150年前，思想巨人马克思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从此，建立人类美好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便成为各国共产党人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当社会主义社会在血与火、风与雨的洗礼中终于诞生之际，在惊喜的同时，人们又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挑战。昔日的榜样苏联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缺点、弊端的不断显露，陡然间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使命感和紧迫感。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将全面展开之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大门，便在这种浓重但却明快的气氛中徐徐开启。

从1955年底起，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就开始较多注意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考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并为此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时间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从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先后找了30多个部委及其他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谈话，收集情况与意见。1956年初，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回京后，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十分感兴趣，便请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替他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从2月14日到3月22日，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几个主管办公室和34个部委负责人的汇报。从4月开始，中共中央又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汇

报。在此期间，工业、交通部门的 900 个主要工厂和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这样大规模地听取汇报，进行调查研究，其目的就是要总结经验，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寻找一条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34 个部委和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厂矿的汇报提供了大量的直接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情况，特别是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资料。这些实事求是的汇报提出了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诸如：

产业结构问题。从建国到 1955 年，中国工农业生产产值全面增长，但其中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农业和轻工业。国家对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也大大超过农业和轻工业，在编制“二五”计划时，又形成了重工业投资进一步挤占轻工业投资的趋势。在汇报中大家谈到，我国重工业基础薄弱，需要优先发展，工业建设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过分突出，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要有合理比例。

工业布局问题。据 1952 年的统计，中国工业约有 70% 分布在沿海一带，只有 30% 分布在内地。其中，钢铁工业有 80% 分布在沿海，纺织工业则有 80—90% 分布在沿海，而内地一些资源、原材料丰富的地区，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都很薄弱。这种不平衡状况对于发展内地工业和国民经济是不利的。“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都要求把新项目主要放在内地，但却因此出现了对于沿海工业的地位估计不足、对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缺乏相应的重视的情况。

产业内部结构问题，主要是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当时，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过急，导致整个工业建设形势全面紧张。1956 年初在编制“二五”计划和更长远的规划时，曾经集中照顾到备战的需要。后虽然作了部分调整，但仍是规模过大、要求过急。

另外，还有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工业方面，大家反映，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办法，不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又容易助长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应当给企业适当的自主权。国家计委的汇报中谈到，今后要大力发展轻工业，要利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既要发挥内地的积极性，又要发挥沿海地区的积极性；既要发挥中央各部门的积极性，又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财政方面，有关部门的汇报中反映，国家对地方经济计划指标和财政收支管得过细、过死，地方实际上无调剂权，地方财政来源小，形成逐级向上要钱的局面，该办的事办不了，也不利于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在农业方面，有的部门和地方汇报中反映农业合作社举办各种非生产性活动过多，影响农业自身的积累和发展。

在听取汇报后，毛泽东在确立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改造经济管理体制及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上的一些思想主张变得更加明确。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第二次讲话。毛泽东这两次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在理论界和党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

毛泽东在讲话中始终贯穿了以苏联为鉴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初步地勾画出了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从这里正式起步。毛泽东在这一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凸现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均作了详细的阐述。在谈到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毛泽东鉴于苏联及许多东

欧国家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片面追求重工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的教训，同时也针对我国重工业投资挤占轻工业、农业投资的情况，指出：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上，当时一些人存有害怕战争破坏沿海工业的思想，同时出现了限制沿海工业发展的倾向。对此，毛泽东也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明确指出：

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指出，即使战争会在短时期内爆发，也要在沿海好好地办几年工业。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见效也快，这是好事情。因此，在内地兴办工业企业的同时，在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甚至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

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要继续，并要大大发展。他指出：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讲到农民问题时，毛泽东十分形象地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断无此理。他要求必须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决不能损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合。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时想办法加以解决。

对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十分重视。而苏联恰恰在类似这些问题上未能很好地加以处理，结果矛盾、问题成堆，各种关系比较紧张。例如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

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

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三 “八大”的创造性成果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一次进一步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初步成果。特别是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看到阶级斗争已不是国内主要矛盾。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切合实际的定位，这是一个可喜的探索成果。大会分析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在中国大陆消灭了；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正在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整体上已基本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知识分子也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空前巩固，队伍扩大了，觉悟程度亦有了很大提高，国内各民族已组成一个团结友好的大家庭；以共产党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在作出上述精辟可信的分析后，大会庄严宣告：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